



怀念张维院士

○ 何东昌

何东昌

教育部原部长，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原副校长

张维同志的逝世，令人不胜悲痛、惆怅。使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与他初次相识以来的一些情景。

提携后生

1946年8月我在上海正在寻找一个大学里的职业。那是因为1945年7月我在西南联大毕业了，但缺一学期的体育没通过未能毕业。系领导为了照顾我，允许录用我为半时助教。当时我已决定响应《新华日报》上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并已确定到滇西一个县去教中学为依托。这些不好对学校讲，所以离校是不辞而别。不久日本投降，“一二·一”惨案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想去解放区，因而在1946年又回到上海。但同志们又劝我留在蒋管区，参加学生运动，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大学的职业，但回头再找清华，有些不好启齿，便找到上海交大一位原西南联大的老师，托他想办法。恰巧交大没有空缺。这时正好张维夫妇回国到上海，那位老师就辗转托他们想办法。

当时我已无职业地在上海耽了几个月，穿一身带补丁的长褂。去拜见了张维同志夫妇。也许是我功课分数还算可以，他们一口答应向北洋大学推荐。他们是新回国的大知识分子，却平

易可亲。对我这个陌生的后生十分热心，使我心里十分感激。不久张维同志从天津北洋大学来信，告知北洋已同意录用我。这样在1947年初我就到了天津。从此与他们接触就多了。我还专门听张维同志的课，从中受到不少教益。1947年夏他们转到了清华。这时清华航空系主任是新来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我过去不辞而别的经过，也借机于1948年初经过申请，来到了清华航空系，并在清华接上了党的关系。以后我与他们就一直都住在清华。没有他们的介绍，我一生的许多机遇也许就很不同了。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张维同志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力学科学家，曾为解决用离心法分离同位素的转子问题，从理论上解决过环壳的力学问题。但同时又非常关心国家的大事，建国初，中苏协议在新疆联合开发有色金属，这件事我们虽然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局是同意的，但从苏方讲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张维同志为此曾向中央写了信，批评了苏联的做法。又如，据刘达同志与我谈起：希特勒德国投降时，一位德国教授保有一块贵金属Pt（铂），因怕被盟军夺走，就托付给张维同志保存。中德建交以后，虽然事隔已多年，张维同志仍设法退回原主，并向组织作

了交待。这表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在“文革”中这是要作为里通外国受审的。刘达同志抓平反冤假错案时曾对张维同志的这种风格大加赞扬。

张维同志并不停留在爱国主义水平上。解放前他对共产党和学生运动是采取同情的态度的。北洋大学有一些进步的教授，其中一位解放后是天津大学的校长，他喜欢打桥牌，几个牌友在一起借机就交换一些新华社广播的消息。其中有一位是与我认识的西南联大的校友，通过他，我借看打桥牌为名，也去了解一些信息。其中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我就传播给了张维同志，引起他们的欣喜。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我记得张维同志夫妇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事物。大礼堂里的大报告也好，上大课也好（因为胜任讲课的人少，当时常采用上大课的形式），听众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并在认真地记笔记。对部队的文艺演出，他们也是每场必到。他们积极参加关于土地改革的学习，以及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各种活动。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他作系主任所在系的苏联专家正好是全校专家的组长，成了学校抓的重点。当时主要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来运用苏联经验，张维同志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样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主义、业务实践，张维同志逐步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并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张维同志的许多表现是难能可贵的。文革中以迟群为首的军宣队控制了清华的局面，蒋南翔同志被送到清华在铸工车间劳动接受监督改造，一直到1974年10月1日前，没有“解放”。他是清华被诬为头号“走资派”的，我们都得与他划清界限，很少有人敢到他的住处去看他。但张维同志去看望了他。又如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张维同志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如认为一些人冲击新华门，借口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一职的事，把攻击

矛头指向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是毫无道理的，是一种阴谋。为此他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因而中央领导同志还让我向他转达过谢意。这几件事都说明了他对党的利益的忠诚。

科教兴国的功臣

固体力学学科点是清华在国际上的相对强项之一。张维同志是清华固体力学的开拓者之一。张维同志通过授课，指导毕业班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科研，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清华的一位领导者对学校办学思想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他对全国的科教事业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中他是首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有一次他从巴黎回来带来了好几套西方国家的中小学教材，介绍给国内。由此可见他对科教事业的远见和关心，视野是很宽广的。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是否应成立工程院一直是有争议的，他是坚决主张建立的，为此与几位同志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呼吁，终于成为现实。这对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的学位制度几经周折，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下终于在1981年经人大常委会立法付诸实施。从此我国第一次有了博士学位制度，标志着我国走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道路。为了科学决策和协调各有关系统的学位工作，国务院设立了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位委员会成员大多是老科学家，张维同志也是成员之一，是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在研究生培养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一位委员，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晚年他又专门向工程院申请搞了一项课题，研究工程教育问题，不顾高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建议。他是力学科学家，工程教育家，不愧是一位实践科教兴国的功臣。■

（转载自薛明德、任文敏主编的《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